



《解放》周刊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

张楠^{1,2}

(1.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2.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 安徽宣城 242000)

摘要: 报刊媒体是中国共产党传播思想、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重要阵地,亦是党的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周刊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客观事实、灵活多样的形式、舆论上的据理力争,有力驳斥了外界对党的形象进行歪曲与污蔑的行径,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坚定立场与责任担当,成功塑造了党作为民族解放者、抗日先锋者和民主捍卫者的良好形象。在《解放》周刊塑造党的形象的过程中,积累了内容呈现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展现形式上灵活多样、宣传策略上主动宣介与舆论引导协调统一的重要经验。这些实践经验不仅有效塑造和维护了党的形象,增强了党的政治影响力与群众号召力,也为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形象; 形象塑造; 《解放》周刊; 党报党刊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4-0191-10

The image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Liberation Weekly*

ZHANG Nan^{1,2}

(1.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2. Theoretical Research Unit, Party School of Xuanche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Xuancheng 242000, China)

Abstract: Newspapers and media serve as crucial platform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disseminate ideas, guide public opinion, and foster consensus, as well as important vehicles for shaping the Party's imag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iberation Weekly*, grounded in objective facts and employing flexible and diverse formats effectively countered external distortions and vilifications of the Party's image through well-founded arguments in the realm of public opinion. It authentically demonstra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resisting aggression, promoting unity, and advancing progress. This effort successfully shaped the Party's good image as a liberator of the nation, a vanguard in the figh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 defender of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the Party's image through *Liberation Weekly*, valuable experience was accumulated in closely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content presentation, adopting diverse and adaptable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coordinating proa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effectiv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ity strategies. These practical experiences not only effectively shaped and upheld the Party's image, enhance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appeal among the masses, but also provided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Party's image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mage; image building; *Liberation Weekly*; Part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形象塑造。党的形象是公众基于党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立场、主张等外在表征,在认知维度形成的对党相对稳定的印象与评价,与党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实践息息相关。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及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蓬勃发展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日救国这一核心任务,开展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形象塑造经验。《解放》周刊作为1937年4月至1941年8月期间党中央创办的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不仅在传播党的主张、介绍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塑造党的形象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围绕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形象塑造载体的研究。例如,徐方平等^[1]、朱一超^[2]、凌富亚等^[3]围绕报刊等媒体对党的形象塑造进行了考察;雷艳芝^[4]则以纪念活动为切入点,对党的形象塑造进行考察。二是围绕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形象塑造路径的研究。例如,洪富忠^[5]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主要路径是积极构建宣传阵地、开展高层人际交往以及促进中外人士赴根据地考察;王多昕^[6]认为,中国共产党从党建、宣传、统战三个维度塑造并提升了党的形象。三是围绕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形象塑造具体样态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党的国际形象^[7]、自我革命形象^[8]、抗战形象^[3]等方面。与此同时,学界对于《解放》周刊的研究也大多聚焦于其思想教育功能与舆论动员功能。以《解放》周刊为载体,系统探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研究则较为匮乏。基于此,本文选取《解放》周刊作为研究载体,从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动因分析切入,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着重分析《解放》周刊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解放者、抗日先锋者和民主捍卫者等形象塑造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总结《解放》周刊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方式方法,以期为新时期党的形象塑造提供有益参考。

一、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动因考察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虽已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实现合作,但国民党并未放弃对共产党进行

政治上的污蔑、新闻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围剿,甚至“把封锁共产党放在比打日本更重要的地位”^[9],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难以被外界所知、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难以被外界所晓。正如斯诺所言,这一时期纵观全世界“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10]。为了增强党的凝聚力、影响力与号召力,消解党的真实形象与国民党所捏造的不实形象之间的反差,更好地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救国的合力,中国共产党亟须借助相关媒介塑造其良好形象。《解放》周刊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宣传舆论阵线上的重要堡垒,作为党联结人民群众的媒介与桥梁,自然成为这一时期党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载体,肩负起增强党的影响力与战斗力、回击国民党的诽谤与污蔑、打破外界对党的误解的重任。

(一)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

政党形象塑造是一项兼具基础性、长期性、复杂性的工程,也是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战略性工作。中国共产党深知,良好的政党形象是内求团结、外谋合作的基石与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便着手塑造革命的、先进的、积极的、民主的政党形象。然而,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党内先后出现了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打击。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不仅直接导致党内政治生态恶化,还间接“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11],破坏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此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党和红军遭到重创,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快速恢复和壮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力量,提出了“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12]549}。随着大量新的革命力量加入,党内成分变得日益复杂,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蔓延。面对党内错误思想造成的不良后果,以及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中国共产党亟须以党的形象建设为抓手,统一全党思想,强化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本色,从而进一步增强党自身的凝聚力,逐步恢复民众对党的信任与支持。

对于政党而言,党的形象塑造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增强党的生命力、凝聚力与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政党形象是政党开展的所有政治活动映射出的最为直观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党的建设就是党主动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锤炼后,中国共

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驰而不息地加强自身建设，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3]602}，才能更好地被民众接受与认可。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将党的形象塑造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内容加以重视，着重强调了党的形象建设与党的作风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来树立党的形象”^{[14]116}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内容之一。

无论是实事求是思想的提出，还是三大优良作风的凝练，客观上都实现了以党的建设带动党员整体素质的提升，进而实现对党的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党的作风与党的形象紧密相连，二者既是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又是提升党内外认同的关键所在。

（二）党正名立信的迫切需要

为实现自身的统治，国民党在很长时间内重点打击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不仅开展“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还实行极为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妄图使共产党在宣传领域“失声”。由于国民党在宣传领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使“赤匪”“暴匪”等字眼逐渐成为国民党所刻画的共产党的代名词。国民党通过宣传领域的污蔑与诽谤，丑化、妖魔化共产党的形象，歪曲、弱化共产党作出的贡献，借此误导国内外民众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妄图削弱共产党的群众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蒋介石仍然抱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致力于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围剿迫害。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党开展的革命斗争变得愈加艰难。为走出此种困境，扩大影响力和战斗力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1934年10月，受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影响，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胜利后，党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在陕北大地上呈燎原之势。国民党为遏制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更为严格且全面的封锁。不仅如此，国民党还不断借助国内外媒体抹黑中国共产党，利用“狂热分子”“杀人放火者”“强盗”等极具贬低意味的字眼来丑化共产党，用“流寇”“匪兵”“赤匪”“共匪”等贬损词语来侮辱红军，使得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愈加扭曲，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要时刻，中国共产党站在维护全民族利益的高度，积极促进第二次国共

合作。此时，国民党当局虽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仍未放弃对共产党的污蔑以及封锁。1938年11月，国民党通过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战时出版管制”，不断打压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又先后颁布《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修正了《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等条例。这些举措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闻封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宣传领域，更是呈现“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15]的残酷局面。

中国共产党深知，政党的影响力归根到底“取决于政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取决于公众对政党及其行为的认同”^{[14]113}。然而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宣传引导下，八路军“游而不击”、共产党“破坏抗战”等不实言论四起，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形象。面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亟须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与重构来恢复声誉，捍牢其在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地位，有力回击国民党的污蔑、诋毁与恶意抹黑。

（三）党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的必然选择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日渐高涨，侵略野心日益膨胀。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非但没有集中全力抗日御辱，反而将斗争矛头指向国内，指向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下，日本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腹地，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国难面前，国民党消极抵抗的行径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无法承担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抵御侵略。风雨飘摇之际，中国共产党以坚韧不拔的信念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族大义与担当，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成为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所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既看到了中日军事实力的悬殊，认识到持久抗战的必要性，更洞悉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最终结局。对此，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2]560}，指出只有依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本帝国主义

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保证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受国民党长期刻画的共产党不良形象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共产党产生了质疑甚至误解。对此,中国共产党唯有加强自身良好形象的塑造,不断消除民众心中对共产党的误解与质疑,才能凝聚民心汇聚力量形成抗日的合力,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诚然,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更是“世界性的抗战”^[16]。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也在与之斗争中不断壮大。此时,长期牵制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中国,逐渐进入世界各国的视野,并吸引了海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由于在国内政治领域的优势地位,加之丰富的舆论宣传,国民党很快便与苏联、英国、美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建立了联系,并获得了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反观活跃在敌后战场的中国共产党,长期受到国民党的政治隔离、军事打压、新闻封锁与舆论侮辱,在争取外部援助方面只能秘密进行。面对重重困难与考验,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要想赢得胜利,单单依靠自身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17]141}。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争取海外援助?在既有条件下,通过塑造良好形象来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刻板印象与偏见,才有机会争取到外部援助,从而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帮助。可见,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不仅是破除外界偏见与质疑、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抓手,更是凝聚国内民众向心力、争取国际支持的必然选择。

二、《解放》周刊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样态呈现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并长期通过报刊等媒体来传播党的声音、塑造党的形象。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新闻封锁和舆论操控,共产党的声音难以有效传递,党的形象被恶意破坏。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原有的《斗争》和《红色中华》等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无法承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塑造党的形象的重任。《解放》周刊的适时创办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与展示提供了新的平台,向海内外人士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民族解放者、抗日先锋者和民主捍卫者等生动形象。

(一)民族解放者形象

近代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加之经济、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首要任务。在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多次探索与尝试未果后,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民族救亡之路。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满足人民群众对自由和解放的迫切需求,实现“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8]133}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周刊为载体,通过宣传党争取抗战胜利与民族解放的方针政策,痛斥国内投降、分裂、倒退势力的卖国行径,以及宣介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相关经验等方式,向民众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不懈追求,从而塑造出党的民族解放者形象。

其一,《解放》周刊通过刊载党的相关文件,宣传党争取抗战建国彻底胜利的方针政策,正面塑造党的民族解放者形象。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救国的目标和民族解放的重任,号召全国人民秉持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参与抗战。在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与此同时,《解放》周刊迅速全文刊载这些重要文件。其中,《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国民党所奉行的片面抗战路线难以达成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目标。若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关键是使其发展成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19]456}。因此,当前阶段“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19]456}成为全党上下的中心任务。此外,《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党必须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共产党员及所领导的民众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作为全国抗战的核心”^{[19]456}。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周刊从第15期开始,连续4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该纲领引领党争取抗战救国彻底胜利工作的具体展开,鲜明地表现出党救国、救民的决心。《解放》周刊的连续刊载,更使党的主张广泛传播于社会各界,极大增强了全国民众对党全

面抗战路线的了解,进一步在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树立了良好形象。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解放》周刊及时刊载了《论新阶段》《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章,深度阐释了党在新阶段抗战方针的调整与深化,着重强调持久战战略以及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意义。这些重要文章的发表,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中国共产党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境的勇气与决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抗战到底的明确立场,进而从正面塑造了党作为民族解放者的形象。

其二,《解放》周刊以犀利的文笔,揭露并痛斥投降、分裂、倒退势力的卖国行径,反面烘托出党的民族解放者形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向全国致电,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抵抗日寇侵略,并积极筹备红军改编出征抗日事宜。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共赴国难的过程中,隐藏在抗日阵营中的投降、分裂、倒退势力逐渐显现出来。他们或是通过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或是消极怠工破坏捣乱,或是制造事端离间国共两党。面对别有用心者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动中国内部分裂、妄图实现对日投降等险恶行径,中国共产党毫不客气地揭露其险恶用心。中国共产党指出,投降妥协分子的种种论调与行动“无非是替日寇之诱降灭华为内应,替汉奸之叛国亲敌作声援”^{[20]418},投降妥协分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江,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膝的实际准备”^{[20]419}。随着《共同防共即是灭亡中国》《反共是日寇汉奸投降派的阴谋》《粉碎日寇的诱降政策》等文章的发表,投降、分裂、倒退势力的丑恶嘴脸被彻底曝光。这些文章犹如利剑,揭露了投降分子试图对日妥协投降的重大阴谋,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鲜明立场,同时也烘托出党民族解放者的形象。

其三,《解放》周刊通过宣介他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相关经验,侧面映衬出中国共产党民族解放者形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清晰地指出,“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18]126-127}在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相互交织的时代境遇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华民族进行顽强抵抗的同时,密切关注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其他国家斗争的动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借助《解放》周刊,着重介绍了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历程与经验,宣扬了西班牙革命斗争的人民性与正义性,并且高度赞扬了西班牙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和平,为了民族独立”^{[19]315}而战的英勇事迹。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分享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共产党在法西斯统治下开展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突显了无产阶级政党所普遍具备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等特性。党通过对世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的赞扬与支持,间接彰显了党对民主与正义的不懈追求以及对自由与解放的坚守,进而使党的民族解放者形象更为具象、鲜活。

(二)抗日先锋者形象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更为激进的侵华策略,导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19]456}为了推动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客观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无私分享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斗争经验。这些报道不仅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先锋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撑。

其一,《解放》周刊通过刊载党的相关文件,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突显党的团结抗战立场。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持久抗战的必要性。一方面,党多次指出“只有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总方针的前提下,坚持不懈地艰苦发动千千万万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不动摇地用一切方法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上最后决心抗战的道路,才能使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发动并取得最终胜利”^{[19]38},并明确了“共产党员要做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21]的目标,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提供了有力保障。甚至在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克制与冷静,从民族解放的全局出发,努力地化解危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上都深刻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坚决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模范,更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和对比分析中日双方的综合实力后,明确指出持久战的战略意义。随着《唯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论持久战》等文章的相继发表,党的抗日主张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在持久抗战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一切抗战领袖、抗战将士、抗战党派与最大多数人民更加团结在一起”^{[17]248},实现了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转化,从而使得党抗日先锋者的形象变得愈发鲜明。

其二,《解放》周刊通过详细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历程,展现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抗日风貌。全面抗战初期,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承担了抵抗日军侵略的关键任务,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样在对日军作战中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据《解放》周刊的报道,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迎来了改编后的首个胜利。报道指出,9月25日八路军为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在晋北平型关与强大之敌激战一昼夜,反复冲锋,我军奋勇向前,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西跑池,小寨村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击毙敌官兵数千,缴获满载军用品的汽车七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大炮两门,炮弹三千余发,步枪数百支,及其他很多的军用品”^{[19]516}。八路军出征以来取得的首个大捷,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敌人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22]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在“不断粉碎和击溃敌人的进攻与围攻中,已经建立起许多的战略支点”^{[23]95},而且坚持长期抗战、持久抗战,有效达成了战略消耗的目的,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为全国抗战形势的逆转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庆祝八路军胜利》《抗战三年来八路军的英勇战绩》等时评、报道、通讯的相继发表,八路军、新四军不怕牺牲、抗战到底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并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塑造、夯实了党的抗日先锋形象。

其三,《解放》周刊通过分享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斗争经验,为抗日战争的深入开展提供战术支持,进而展现出党抗日救国的担当与作为。抗日战争爆

发后,鉴于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情况,以及抗日救国的迫切需求,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积极地分享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王若飞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连续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于,“他是真正人民的军队,他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有着坚固一致的团结,有着英勇牺牲的精神,有着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24]12}林彪分享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巧妙运用地势、善于团结群众、注意战术配合等成功经验。项英分享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此外,《抗日战争的经验》《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破坏》等文章的相继发表,均从不同维度分享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经验。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持续分享对日作战的宝贵经验,不仅提升了各抗日武装的作战能力、增强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凝聚力,而且在军事斗争领域的经验分享中,使党的抗日先锋形象变得更加丰富、立体。

(三)民主捍卫者形象

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13]542}。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25]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承担起宣传民主、推行民主、捍卫民主的重任。全面抗战爆发后,《解放》周刊通过通讯、时评、论著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民主理念,介绍党的民主实践,从而塑造出中国共产党民主捍卫者的形象。

其一,《解放》周刊通过宣传党的民主理念,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世界各国革命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经验,并以此向人民群众阐明,“只有给民众以民主的权利、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潜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19]10},“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26]才能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真正的民主应是多数人的民主而非少数人的民主,是真实的而非空洞的。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建立一个国体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为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在其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围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详细阐释。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系统论述，不仅真切地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前途与道路问题，而且指明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路径。此外，《解放》周刊还陆续发文，通过介绍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特点以及其在乡级层面的具体实践，推动党的民主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推广。这些关于党的民主理念的阐述、关于建立民主政治重要性的宣传，不仅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深化了人民群众对党所倡导的民主运动的认同，为塑造党作为民主捍卫者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其二，《解放》周刊详细报道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建设情况，为全国民主政治建设树立了典范。在民主选举方面，据《解放》周刊所发表的《边区各乡各区政府选举运动的总结》一文，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乡、县和边区三级民主选举的有益尝试。这次选举秉持着彻底的民主原则，通过“不分阶级、党派、种族、性别及宗教信仰的普遍选举”“不分职业、文化程度、财产、资格及民族差异等的平等选举”^[24]¹⁶等方式，使各级议会议员及政府的行政首长由人民群众直接选出，以保证“代表广大劳动民众及整个民族利益的人们参加到新的民主政权机关中来”^[24]¹⁶。在民主权利保障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民主政治、增强人民自治能力、保障人民言论等各项权利的同时，还将“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选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罪行之自由”^[20]²⁴⁷纳入其中。党通过法规的形式来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为民主实践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在边区政权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即“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27]。《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重要文件的广泛传播，既有效地推动了民主理念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又深刻揭示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可操作性，使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民主捍卫者形象不断生根发芽。

其三，《解放》周刊揭露了别有用心者企图借“民主”之名来曲解和取消民主的阴谋，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与追求。在全国人民开展抗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时，出现了一些以拥护统一的名义来曲解与反对民主的声音。针对这一情况，《解放》周刊先后发表了《答复若干反对民主运动者的驳难》《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三民主义》

等文章，揭露了陶希圣、杨立奎、叶青等人的荒诞言论及其背后破坏民主的险恶用心。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民主政治是“要使真正的广大的人民，能有政治的权利，能够参加政治”^[19]²⁵⁹，而深入推进民主建设与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在于“需要政府的民主改革与人民的民主自由”^[19]²⁶³。唯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切实的民主权利，才能在民主政权的管辖区域内营造广泛的民主氛围，从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解放》周刊围绕民主问题展开的相关阐述与论争，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认清民主的真正内涵，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主理念的拥护，使党作为民主捍卫者的形象在民众心中愈发丰满。

三、《解放》周刊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方式方法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与战略相持阶段，《解放》周刊以其准确的言论导向、丰富的内容构成和多样的形式，向广大民众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有效提升了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并在国内外民众中塑造了积极的、向上的正面形象。

（一）以客观事实呈现勾勒党的形象

政党形象作为政党气质、特征、主张的一种外在表现，与政党的产生、政党活动的开展相伴而生。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形象是在带领中华民族摆脱黑暗与苦难、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是在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互动中逐步凝结而成的。因此，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塑造党的形象，自然不能脱离党所领导的抗战实际，孤立地谈形象塑造。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实践主体有意识、有目的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通过对实践主体所展开的实践活动进行审视，自然能够发现实践活动其背后所蕴含的实践主体的思想、动机、主张、意志，从而形成对实践主体相对稳定的认识与评价。

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让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所提出的主张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不仅是人民群众直观了解和认识党的重要途径，更是党塑造自身形象的有效手段。因而，一方面党始终注重将自身主张与实际斗争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通过《解放》周刊等舆论阵地，将党的政策主张置于具体抗战实践之中予以阐释。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周刊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支撑，或通过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阐释，直接展现党的本体形象；或通过对抗战前

线战况以及根据地建设情况的报道,间接展现党的行为形象。这些翔实的内容,不仅增进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而且通过对党领导革命斗争实际的客观呈现,进一步塑造了党革命的、民主的、抗日的形象。

(二)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描绘党的形象

政党形象作为主客体关系状态的一种反映,是主体塑造与客体评价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怎样把党的内在本质转化为公众心中相对稳定的评价?这就需要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讲好党的故事,持续深化民众对党的感性认知,进而使党的主张与行为转化为人民群众所认可的具体形象。为此,《解放》周刊自创刊以来,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解读和中国革命形势客观呈现的基础上,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方式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力与影响力,进而使党在宣传领域逐步掌握主动权,为党良好形象的塑造提供有力支持。

通过系统梳理可知,《解放》周刊在其发行期间,开设了诸如时评、论著、通讯、翻译、文艺、广告等栏目,刊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共产国际重要文件,以及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研判、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的论述等各类文章,共计1100余篇;周刊综合运用评论、社论、通讯、诗歌、漫画等多样化的形式,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党的政治主张与实践举措。周刊既以短小精悍的评论对时局进行剖析,也以深入浅出的社论对政策予以阐释;既借助真实生动的通讯记录前线战况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也以极具感染力的诗歌和直观鲜明的木刻作品深化民族情感认同。这些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不仅拉近党与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有效地将党的人民立场、抗战决心转化为能够为被广大民众所了解、感知的话语和图像,使党的形象在群众心中逐渐具象化、情感化,而且进一步刻画了党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应然形象,与民族解放者、抗日先锋者和民主捍卫者等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实然形象实现有机融合。

(三)以据理力争的舆论刻画党的形象

党的形象塑造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离不开有效的传播与沟通。然而在传播与沟通过程中,不乏别有用心者通过恶意构陷、造谣,诋毁、破坏党的形象。因此,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掌握话语主动权,争夺话语权,才能达到塑造并捍卫党的形象这一目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救亡

事业中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但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叛国投降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妥协退让,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存有戒心,即使在抗日战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仍未放弃“剿共”政策,千方百计地丑化党的形象,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对此情形,《解放》周刊编委洛甫(张闻天)、吴亮平、博古(秦邦宪)、胡乔木、蒋南翔、陈伯达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迅速撰写文章并组织舆论反击。此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重要领导人也踊跃投身于《解放》周刊的文章撰写及编辑指导工作。以《解放》周刊编委及撰稿人为代表的党的宣传工作者,凭借理论上的深刻阐释、国情上的深入剖析、事实上的客观呈现,既有力驳斥了各类错误言论、澄清了民众的认知误区,又有效回击了敌对势力的舆论攻势,使党进一步掌握了宣传领域的主动权,从而维护党的声誉与形象。尤其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积极参与,不仅提升了《解放》周刊的权威性与影响力,还有效地将党的意志传递到广大民众之中,使党坚持真理、坚守正义、一心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质为民众所熟知并认同,进而在广大民众心中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

四、《解放》周刊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当代启示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传递革命理念、播撒民主火种、凝聚抗日民心,成功塑造了党的良好形象,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追昔抚今,总结《解放》周刊在塑造党的形象方面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入了解党报党刊等媒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塑造党的形象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亦能为新时代政党形象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一)注重理论阐释与事实呈现有机结合

党的形象作为党气质、特征、主张的一种外在体现,与其政治活动的开展密切相关。换言之,党在其领导的一切活动、斗争中所展现的风貌样态,都是其形象的具体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塑造自身形象时,应汲取《解放》周刊在塑造政党形象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充分发挥媒体在理论宣传、舆论引导中的独特作用。一方面,要以真实、立体、全面的叙事展现党的执政理念与价值追求,在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广泛联结的基础上讲述党的奋斗经历与积极举

措,进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在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中维护党的形象。另一方面,应以理论上的深度阐述来回应社会关切,既要讲深、讲透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又要用鲜活的实践案例印证理论的科学性。在理论阐释和实践赋能的双向互动中,为中国共产党塑造可信、可靠、可敬、可爱的大党形象积聚能量。

(二)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协同发力

党的形象塑造是一个关涉主客体传播与互动的复杂过程,需要依托一定的媒介与平台,运用多元化的宣传手段,将党的主张、理念以及实践成效高效传递至人民群众,并获取人民群众的认可。在当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宣传方式的选择与宣传形式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强化党的形象塑造工作,需充分依托全媒体所具备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特性。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权威性高、覆盖性广等优势,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理论创新成果,深入解读党的方针政策的核心要点,不断增进民众对其的理解与认同,进而持续提升传统媒体的引导力、影响力与公信力,在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与公信力的基础上夯实党的形象根基;另一方面,应积极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构建多渠道全媒体传播矩阵,充分利用新媒体即时性与交互性的特点,生动地展现党的创新理论和实践成果,更好地宣传与服务群众,从而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夯实人民群众对党的形象认同,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可信、可靠、可敬、可爱的大党形象。

(三)注重主动宣介与舆论引导动态平衡

韦伯曾说:“任何权力——甚至生活中的任何好运道——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28]这种辩护既是维护自身形象的客观要求,又是回应外界质疑的必然选择。然而,要想具备自身立场与主张的辩护能力,就必须在宣传阵线上主动作为、积极发力,着力争取话语主导权与舆论话语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主动宣介自身理念和政策,及时有力地回击负面舆论,是加强自身辩护、巩固政党地位、塑造和维护政党形象的关键举措。新时代党在塑造党的形象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主动宣介与舆论引导的动态平衡。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积极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传播矩阵,精准推送内容,弥合以传统媒体为主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之间的鸿沟,使党的声音高效地传递到群众之中,从

而拉近党与人民的距离,使党的形象在网络空间中变得立体、生动;另一方面,需要坚守宣传阵地,强化舆论引导,在清除负面信息的基础上,更要牢牢把控宣传阵地,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负面舆情状况,积极开展舆情疏导工作,为党的形象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执政理念、价值追求的具象表达,也是党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的生动体现,更是人民群众对其认知与评价的直接映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有效传播抗日主张、回应外界质疑,在复杂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中树立了民族解放者、抗日先锋者、民主捍卫者等优良形象。这不仅显著增强了民众对党的信任与支持、有效反击了敌对势力的恶意中伤,还为战后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主要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国这一核心任务,围绕《解放》周刊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民主等形象的塑造展开研究,但尚未全面挖掘该周刊塑造党的形象的其他样态。未来可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域,深入剖析《解放》周刊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其他形态,进一步发掘党报党刊在塑造党的形象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价值,从而为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提供有益支持,为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徐方平,张昊.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1):58-68.
- [2] 朱一超.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自塑的探索:基于《〈共产党人〉发刊词》的考察[J].毛泽东研究,2025(3):79-88.
- [3] 凌富亚,唐倬.海外侨报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考察[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2):29-38.
- [4] 雷艳芝.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考察对象[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7):52-61.
- [5] 洪富忠.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以大后方为中心的考察[J].党的文献,2021(6):104-111.
- [6] 王多昕.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实践理路[J].党政干部学刊,2025(2):57-64.
- [7] 汤志华,梁法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构:以《华商报》为视角[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18(4):92-99.
- [8] 李金玲.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形象建构[J].理论建设,2023,39(4):78-87.
- [9]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M].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1988:251.
- [10] 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
- [11] 黄道炫.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J]. 近代史研究,2003(5):80-113.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王长江. 政党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0.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 [17]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解放):第5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9]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解放):第1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 [20]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解放):第4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 [21]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解放):第6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317.
- [22] 王秀鑫,郭德宏.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M]. 2版.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199.
- [23]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解放):第3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 [24]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解放):第2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 [25]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0.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00.
- [27]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解放):第7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294.
- [28] 韦伯. 支配社会学[M]. 康乐,简惠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19.

(责任编辑:陈 婧)